

戰時下殖民地台灣表象的生成 ——以一九四〇年「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 的訪台為例

楊智景

御茶水女子大學人間文化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

中文摘要

本論文的出發點在於關注一九四〇年前後殖民地台灣表象文本之生產狀態。具體而言，本論文嘗試以一九四〇年由日本文藝家協會發起之「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的訪台活動為一事例，特別著眼於其成員的演說內容以及此次訪台經驗在他們各自的創作行為或作品上實踐的狀況。並且從當時文學者們在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及戰時體制影響下所抱持的文學（者）觀，以及同時期南進政策論、台灣據點論的盛行等時代因素作為分析觀點，探討台灣表象文本的生產與這些時代因素間的關連性。透過探討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的台灣之行，本論文欲突顯的則是：其一，在當時時代氛圍的影響及配合新體制的趨勢下，文學者們文化宣傳、思想建設為重心的活動型態，亦即文學者們「褪下文學者的盔甲，回歸現實主義」的姿態，影響了他們實際的創作行為。而創作行為的消極化間接地影響對相關殖民地台灣表象文本的生產。其二，殖民地台灣表象的式微跟南進據點論的關連性。亦即，南進政策觀點超前的結果，侷限了文學者們對殖民地台灣的想像，致使文學者們僅抱以一種過渡的心態，未能視台灣為一對象以進行深入地去觀看或書寫。而那是殖民地台灣表象或相關文本見諸於內地媒體的頻率並未與台灣在南進政策中的地位重要性成正比，卻反而呈現後退現象的因素之一。

關鍵詞：文藝銃後運動 國民精神總動員 南進政策 殖民地台灣表象

**A Generation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Taiwan Colony during Wartime :
An Example of the Lecture Visit to Taiwan
by the Liberal Arts Homefront Movement
in 1940**

Zhi-Jing Yang

Graduate Student, Ph. D Program,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Ochanomizu University

Abstract

Starting in 1937, in the midst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re appears a phenomenon by which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ve Japanese writers (excluding those writers already living in the Taiwanese colony for an extended period) towards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in Taiwan begins to gradually decrease. An example would be the lectures given by visiting literary writers with the Liberal Arts Homefront Movement, independently arranged during wartime. The topic of the lectures given by the five writers (Kan Kikuchi, Ashihei Hino, Masao Kume, Minoru Nakano and Eiji Yoshikawa) concerning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of works related to the Taiwan lecture trip, are relevant to the aforementioned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riters' literary view under the wartime regime and the policy of southward advancement—Taiwan base theory, which prospered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reveals two findings as follows. Firstly, the

activity of the literary authors shifted towards a collaborative effort and numerous battlefield literatures, military service related literature, were created by the social situation under wartime rule of that time and the call for a new system. Specifically the writers became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battlefield conditions, which symbolized the decline of the Taiwan colony in the eyes of those in the Japanese motherland. Secondly,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cline of the Taiwan colony and the progressively large southward advancement base theory is also relevant to the phenomenon. The idea of the southward advancement policy, Taiwan base theory, narrowed the scope of concern to Taiwan and the breadth of creativity amongst the literati. Therefore Taiwan only touched lightly upon their non-native related work as the military base/way point for the southward advancement, and it could not be easily adapted to the subject matter the work described.

KEY WORDS : Liberal Arts Homefront Movement
national moral general mobilization
southward advancement policy
representation of Taiwan colony

戰時下殖民地台灣表象的生成

——以一九四〇年「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的訪台為例

一、前言：研究動機與方法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的發生，不僅衝擊日本帝國對外的勢力延展策略，同時牽動日本帝國內部各個階級與整個社會的精神動向。同年九月「國民精神總動員」（以下簡稱「精動」）運動開跑，一九三八年國家總動員法案公布。而各種名目的報國會也應運而生，法案中各種嚴密的限制及規定的實行更加速地驅使日本國民尋找定位，呈現出一片在對外戰爭中不分種族、階級、世代、性別的總體動員景象。這股風潮不可豁免地也吹進了彼時的文壇、甚至吹到了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台灣。

隨著戰爭情勢的愈演愈烈，其影響層面亦隨之擴大。在當時日趨熾烈的戰爭情勢以及新體制的展開下，日本文壇有何具體的動作以及各個作家們是如何地在文學與國策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並付諸具體行動？再者，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後被納入日本帝國版圖的殖民地台灣，為近代日本文學者在創作上提供了不少新奇的題材。以來日本文學者對殖民地台灣的書寫，多半是建立在往來於日本內地與殖民地台灣的移動及旅行行為的基礎之上。但隨著中日戰事的白熱化以及南進政策的正式展開，文藝家們以往以旅遊為目的的海外旅行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以戰地記者的身分或者以體制內的從軍作家身分來去於日本與外地之間者多有所聞。文學者們大舉前往戰地的開端起始於中日間正式開戰，各雜誌社、報社為因應大眾對戰地情報的狂熱而於八月至九月間紛紛派遣文藝特派員前往中國大陸作戰地採訪。例如，東京日日新聞社及大阪每日新聞社各派遣了吉川英治和木村毅，主婦之友社則是吉屋信子，中央公論社派出了

尾崎士郎與林房雄，改造社派了立野信之，之後各大新聞雜誌便開始出現許多由文藝家特派記者們所寫的戰地報導或戰地小說。¹一九三八年七月由佐佐木邦、森下雨村等十一人擔任發起人，並邀集了小島政二郎、中村武羅夫等四十位大眾作家組成「大日本文學研究會」，同時跟海軍方面作了「以筆桿強化國策」的協議。²一九三八年八月，火野葦平的戰地小說〈麥與士兵〉刊登於《改造》獲得廣大的迴響，不但因此受到陸軍當局的矚目，並促使當局興起對國內文學者們進行戰爭動員的計畫。³接著八月二十三日由內閣情報部召集日本文藝家協會會長菊池寬等文學者十二人進行商議，並提出派遣計畫。陸軍當局與文學者們的協商順利成立，文學者從軍部隊便於焉誕生，一般將它稱為「筆桿部隊（譯註原名：ペン部隊，ペン=pen）」。「筆桿部隊」正是軍宣傳部隊的開端，它也被視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旬開始的南方徵用作家制度成立的基礎。⁴而不同於「筆桿部隊」地，南方徵用作家乃是由國家依據一九三八年四月成立的「國家總動員法」下之「國民徵用令」，所發出的徵召而入隊，俗稱「白紙」徵召，但「國民徵用令」被用於徵召文士從軍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才開始的⁵。

上述一連串的文學者派遣・徵用制度的實行使得文學者們的外地移動行為產生巨大變化。而這是否也影響到日本內地文學者們對殖民地台灣這個書寫對象的關注程度。進一步具體舉例而言，筆者嘗試略算一九三七年七月之前（一九三〇～一九三七）與之後（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在《中央公論》《改造》兩雜誌上所出現的殖民地台灣相關文本的合計篇數約是十六篇與四篇⁶，可以看見在數量

¹ 奥出健，〈日華事变と文壇—ペン部隊の結成まで—〉，《日本近代文学の諸相》（明治書院，1990年），頁373。

² 日本近代文學館編，〈文學者の從軍〉，《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第四卷》（東京：講談社，1984年）。

³ 櫻本富雄，《文化人たちの大東亞戦争——PK部隊が行く》（東京：青木書店，1993年），頁14。

⁴ 神谷忠孝、木村一信編，《南方徵用作家——戦争と文学》（京都：世界思想社，1996年），頁6。

⁵ 櫻本富雄，《文化人たちの大東亞戦争——PK部隊が行く》（東京：青木書店，1993年），頁43。

⁶ [1930-1937年]：河野密〈霧社事件の真相を発く〉《中央公論》1931年3月号（以下《中央公論》）／安藤盛〈蕃婦のエロティシズム〉1931年6月号／佐藤春夫〈殖民地の旅（一）（二）〉1932年9月号、10月号／米沢商〈台湾統制の現段階〉1934年新人号／大鹿卓〈野蛮人〉1935年2月号／野間五造〈領台四十年〉1935年11月号、12月号／河野密・河上丈太郎〈霧社事件の真相を語る〉《改造》13卷3号，1931年3月（以下

上有段差距。倘若將文本數量上的減少視為文學者對書寫對象關注程度的降低的話，⁷那麼它跟當時殖民地台灣對日本帝國之軍事重要性相對增強，以及文學者們在南進政策的前提下所進行的海外旅行日益頻繁之間是否有所關連。

當然，僅就兩雜誌上所觀察到的現象並不足以代表全體，亦不能就此斷言整個戰時下台灣表象的成立與政治·政策因素之間的關係。故本稿，透過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1940年5月～1941年12月）的訪台活動（一九四〇）此一事例，以逐步分析其參加成員在演說中所呈現的戰時下文學觀、相關的報導以及成員們的訪台經驗在文本上的實踐狀況，並對照同時代其他日本作家訪台的紀行文字，且留意國策、時局等因素的影響之方法，探討它們相互間的作用。目的主要側重於說明時局·國策等因素如何地關係著文藝銃後運動訪台成員們所關注的焦點之確立，進而影響殖民地台灣表象文本的生成。選擇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為例的原因為，其一乃在於該會是戰時下規模最大的以文學者為主體的自發性文化運動；其二，它活動的期間恰處於「筆桿部隊」到「軍宣傳部隊」（作家徵用）起步的空檔期，在整個文士從軍活動上，具有承續串連的意義；其三，基於其背後存在文藝春秋社這個強大的媒體資源之優越條件，因此假設它將有助於殖民地台灣表象文本的成立與流通。

二、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的成立至訪台的經緯

一九三七年七月發生盧溝橋事變，八月由閣議決定「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要綱」，九月「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開始。當中在實施方法的部分明白地表示

《改造》）／北村白秋〈華麗島風物誌（一）（二）〉16卷11号、13号，1934年10月、12月／早坂一郎〈台灣地震地巡見雜記〉17卷6号，1935年6月／野上弥生子〈台灣游記〉18卷4号，1936年4月／野上弥生子〈蕃地の人々〉18卷5号，1936年5月／足立源一郎〈台灣の旅より〉18卷6号 1936年6月。[1937-45年]：中西伊之助〈蕃社夜泊記〉《中央公論》1937年8月号／関口泰〈南進の拠点台湾〉《中央公論》1940年7月号／杉山平助〈台湾を論ずる〉《改造》22卷12号，1940年7月／杉山平助〈台湾の旅〉《改造》22卷13号，1940年時局号。

⁷ 然而，例如中村地平、真杉靜枝皆於1939年至1941年間在《文學者》、《婦人公論》等雜誌上發表多篇以台灣為書寫主題的小說、隨筆及單行本《台灣小說集》（中村，1941）、《南方紀行》（真杉，1941）。但是不可忽略的是中村與真杉兩者在殖民地台灣長期的生活經驗，因此在他們筆下的台灣表象文本的生成，生活經驗與心理因素的影響更甚於時局和政策因素。故此類文學者的例子，有另闢他稿討論的必要。

「尋求文藝、音樂、演藝、映畫等領域之相關人士的協助」。在動員藝文人士的同時，政府當局亦言明「加強對言論文章的取締」。然關於言論統制早在事變發生之後近衛內閣的「舉國一致」聲明當中即明白地訂出對於「反戰反軍或離間軍民的言論、懷疑日本國策為侵略主義的言論、對日本不利的外國媒體報導」將加以統制等事項。而上述加強取締的措施，引起文壇人士的不安與關注，紛紛發表言論表示批判或支持。其中被時人認為是文壇經濟支柱的菊池寬，早從一九三七年的事變發生之初即開始在其所主持的雜誌《文藝春秋》〈話之屑籠〉專欄上發表對中日戰事的言論及對國策的質疑。菊池在〈話之屑籠〉中談到，「任何法案，只要是為了國家的，大家都會贊成，大家最關切的是言論自由，但我們對當今的言論統制卻著實難以忍受」（《文藝春秋》一九三八年四月號）。在接受軍部邀集之前，菊池對於當時的國策，基本上雖然抱持共體時艱的態度，但是就言論統制的部分則表示相當程度的不滿與不信任。然而三八年夏天軍部計劃號召文士從軍，於是發函邀請了以菊池為首的一群文藝家，欲尋求協助及討論具體事宜。軍部的此一舉動竟令菊池深為感動，在〈話之屑籠〉（《文藝春秋》一九三八年十月號）中寫道，「平時我總透露對於國家不重視文學的不滿，但是這一回（國家）主動地承認（文學的用處），還要以我為中心去進行討論派遣的事宜。因此，我決定不再顧慮自己的健康安危、方不方便，要率先接受派遣。」菊池以為當局終於承認文藝家們對處於戰事之中的國家的價值與貢獻度，於是菊池的態度一轉，對軍部展現出支持與配合的姿態，並挺身率先發揮其藝文界龍頭老大的號召力，廣泛邀請當時的文藝家們共襄盛舉，特別呼籲文學者貢獻所長。由上述兩段話，可見菊池在接受軍部邀請前後所表現在言論上的差異性。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旬，「筆桿部隊」分成陸軍部隊（十四名）與海軍部隊（八名，菊池、佐藤春夫、杉山平助、吉川英治隸屬此隊）前往漢口，十月十七日左右返抵東京，一行人便直趨明治神宮進行參拜。而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正就是在當時那種對戰爭狂熱的社會背景脈絡下出現的重要文化動員活動之一。⁸

⁸ 奧出健，〈文芸銃後運動講演會の紀錄——菊池寬、小林秀雄のことなど〉，《湘南短期大學紀要》第3卷第1號（1992年），頁53。

文藝銃後運動成立之前，文士們已經經歷了非官方（一九三七年八～九月報社、雜誌社陸續派遣文藝特派員一事）與官方（一九三八年九～十月陸軍軍部召集的「筆桿部隊」）的動員經驗。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於一九四〇年由當時的文藝雜誌媒體重鎮「文藝春秋」社社長暨文藝家協會會長菊池寬所發起，由於菊池的聲望及其大力號召，一開始便集合了文壇人士五十餘人參加擔任講師，演講活動本身從一九四〇年五月持續至四二年，此期間參加擔任講師的文壇人士共達九十餘名。演講會所經之處除了原先所計劃的日本內地城鄉之外，後來還陸續增加朝鮮、滿洲、沖繩及台灣等地。「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的訪台活動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在台灣的北、中、南部進行了約為期一週的演講行腳。訪台之行原來並未列在其所定計畫之內，然由於在日本內地各處舉行之後獲得熱烈迴響與好評，更加上台灣總督府透過臨時情報部對該演講會的活動積極地予以贊助並且提出訪台邀請，因而決定在巡迴了內地和朝鮮等地八十餘處之後追加以殖民地台灣作為第一回文藝銃後運動全國巡迴演講的終站。⁹

此外，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的訪台尤其值得矚目之處，一是其來訪成員，二是其來訪時期。此次成員雖僅僅五人，相較於日本內地的動輒十人上下，確實在人數上稍微遜色。但是此次來訪文藝家，有菊池寬、火野葦平、久米正雄、中野實、吉川英治，這些成員皆是以大眾文學或從軍文學活躍於當時的文壇健將。菊池寬的名氣自然不遑多論，其中還不乏當紅的戰地文學作家，如火野葦平、久米正雄等人。在日本內地他們可說是掌握到某種程度的新聞媒體資源及發言管道的一群人。從這樣的陣容來看足以預見此一行人所受到的期待以及對全島所形成的風靡程度。此外附帶一提的，四〇年十二月此一以菊池為首的演講團來訪，在此之前，十月份有大政翼贊會，繼之隔年四月有皇民奉公會的成立。從這一連串的精神動員活動發足的脈絡，再加上受邀於台灣總督府並以精神文化建設為演講重點的特徵來看，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的訪台之行莫不具有將島內民眾及文化界的意識形態引導至戰鬥態勢的意涵。

⁹ 《文藝銃後運動講演集》（東京：文藝家協會，1941年），頁141-146。

文藝銃後運動講演團的訪台是在台灣總督府積極地邀請協助島內皇民化運動的推進下而決定追加成行的。台灣之行原本未列於第一回巡迴計畫之內一事，則不免令人疑惑殖民地台灣在當時文化界人士心目中的定位。四〇年代台灣文學走入皇民化文學期，無論是台灣人作家或者是在台日本人作家，因局勢所限，在文學創作上不得不配合時勢與國策或是嚴格的言論規制中找尋夾縫，儘管受縛於層層的侷限，但至少「台灣」這個主題仍然在媒體中存續。而概觀日本內地作家生產的文本，殖民地台灣看似個漸被忘卻的書寫對象。並且就同時代的外地文本生成情況而言，一九四〇～四一年間在《都新聞》《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等數類報紙上，關於滿洲方面的文章約有三十篇，南洋方面約二十五篇，朝鮮方面近十篇，台灣方面則約五篇，¹⁰可見台灣書寫相較於滿洲、朝鮮、南洋等地的相關文本，在數量上有明顯差距。此外，訪台成員之一的久米正雄可說是具有豐富的外地經驗，所寫下的報導文中也不乏以南京、武漢、上海、漢口、滿洲為主題的紀錄¹¹，但關於台灣表象的部分還尚待發掘。上述現象的存在，不得不令人意識到它是否與日本內地作家對台灣這個空間場域的認知、亦或台灣在帝國日本當中的定位有所關連。究竟該如何解釋其背後所蘊含的意義，以下，就試以文藝銃後運動講演團的訪台活動為一事例，一面還原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訪台活動的樣貌，一面對上述現象進行分析。

三、國民精神總動員體制下的文學（者）觀

神谷忠孝在《南方徵用作家》序論中扼要地說道，戰時下文學者們所從事的戰爭協力文化工作大致可分為三大類。一、對占領地的宣傳，即以普及日語為中心；二、對軍隊宣傳，以日本軍人為對象，以激勵士氣和普及聖戰思想為

¹⁰ 奧出健，〈日中戦争下の新聞「外地」文芸記事一覧（2）〉，《湘南短期大學紀要》第 11 號（2000 年），頁 234-239。

¹¹ 久米正雄，〈南京の思ひ出〉，《大阪毎日新聞》，1937 年 12 月 8 日／〈武漢戰略戰〉，《東京日日新聞》，1938 年 10 月 9-10 日／〈九江の秋霖日記〉，《朝日新聞》，1938 年 10 月 13 日／〈上海巡り〉，《大阪毎日新聞》，1938 年 10 月 17 日／〈漢口にて〉，《大阪毎日新聞》，1938 年 11 月 2-3 日／〈滿洲文藝〉，《東京日日新聞》，1942 年 10 月 6-9 日。其中以文藝特派員身分所寫的現地報導居多，故仍然需考量迫於稿約的可能性。

目的；三、對敵宣傳。¹²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的對象雖然是一般民眾，但是其目的則可歸類為第二項：激勵士氣與普及聖戰思想。

文藝銃後運動於形式上雖然是文壇人士的自發運動，但是在《文藝年鑑》也明言道它是「在面臨國家的非常時期之際，文藝家們為配合國民精神總動員而提案的」，¹³因此它當然地繼承精動運動的宗旨，從文藝、文化的觀點切入，提升戰地與後方的民心士氣為目標。而它以精神文化貫穿整個文藝銃後運動演講活動主軸的特色是始終一致的。接下來的介紹稍微冗長，但為助於了解文藝銃後運動演講，並且為一窺該會在台灣巡迴演講時的內容，在此試舉曾在台灣北、中、南部各處登壇演說的菊池寬等五氏的講演加以介紹。他們五位的講題分別是，菊池寬〈事變與武士道精神〉、中野實〈歸還感言〉、火野葦平〈前線與銃後〉、久米正雄〈文藝的事變處理〉。根據文藝家協會所編《文藝銃後運動講演集》中收錄的多位演講者的草稿或演講紀錄，各個演說者的主要內容分別如下。

菊池寬〈事變與武士道精神〉：¹⁴菊池主要詮釋了武士道精神的定義，並對它於當前戰情高張的局勢中所扮演的重要性及必需性予以理論性論述，後加以宣揚。當中他引經據典，從萬葉和歌到英國劇作家 John Galsworthy 的詩、論語、佛禪教義，以及日本歷史人物宮本武藏的軼事，說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四大精髓在於捨身、殉死、名譽及節義。菊池的演講之主要意旨就在討論「死」的問題，亦或說是宣揚在武士道精神之下「死」的美學。身為日本帝國子民應該懷抱武士道的精神不畏死，寧可死而不願苟活；並且只要是日本男子都理所當然要為天皇而死，為國家而戰；不需執著人生的長短，因為肉體只是靈魂短暫的軀殼，而效法武士精神的吾人其生命內涵與思想則是永久不滅的。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軍人們當如是，而在後方的眾人亦應該共體時艱，忍耐物資不足所帶來的困窘，吾人的敵人是韌性堅強的中國人，為了建立東亞新秩序，在大後方的國民們要比敵人更堅強，並善盡作為後方民眾的責任。而菊池自認仍是具有入世價值的，而身

¹² 神谷忠孝·木村一信編，《南方徵用作家——戦争と文学》（京都：世界思想社，1996年），頁9-12。

¹³ 文藝家協會編撰，《文藝年鑑2600年版》（日本：東京第一書房，1940年），頁39。

¹⁴ 《文藝銃後運動講演集》（東京：文藝家協會，1941年），頁7-28。同一題目，但以在滿洲的演講內容為底本。

為文學者·文化人的後方責任就是，發揮操作文字語言的表現能力，將自身具有的正確思想、精神與文化不斷地宣揚，以鼓舞激勵後方民眾迎戰的士氣。

中野實〈歸還感言〉：¹⁵中野於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間有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在廣東、海南島等地隨軍活動。擔任南中國派遣軍報導部的對中國宣傳班班員一職務。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演講的開頭首先表明，自己並非從文學的角度談論前線或後方的問題，而只是想以一個從戰場歷劫歸來士兵的觀點跟聽眾報告參加中日戰爭的感想。中野從宣傳班員的經驗與角度，分析作戰最重要的宣傳戰，透過實際例子對新聞雜誌或是廣播電影等電子媒體在作戰中的重要性予以說明。主旨就在於呼籲在場聽眾，雖然身處安全的後方，但要與前線戰士懷抱相同的堅定不為所動的作戰精神和信心，切勿掉進敵人所設的心理戰術陷阱；另一方面並且謹言慎行，切勿讓自己無心的言行被敵人利用成為削弱日方士兵士氣的工具。更重要的是秉持為天皇而死為國家而戰的信念，摒棄自由主義、利己主義，才是取得對中國作戰勝利的重點。

火野葦平〈前線與銃後〉：¹⁶跟中野實相同地，火野亦刻意強調自己並非從文學者的立場，而是以一個返鄉士兵的身分，發表直率的感言。同時強調自身的演講主要在於期盼並喚起後方人士能夠多關心前線的狀況，體恤沙場戰士們的心情與辛勞。火野從自己的親身體驗感歎地談到，歷劫歸來的返鄉將士們非但得不到應有的敬重，甚至被漠視，對此火野深感不平。另外，對於報章雜誌媒體對在中國的戰況漠不關心的態度，火野亦深感不滿且加以強烈批判。在媒體以追求新鮮及話題性為優先的情況下，許多從軍作家或記者們赴湯蹈火的戰場真相報導都被犧牲了。因為戰況報導文學占不了報章雜誌的版面，於是便形成一種中國戰場平安無事的假象，使得以那些媒體為資訊來源的讀者們便不知不覺地減少了對戰事的關心，忽視將士們的辛苦。又或者媒體追求有躍動感·速度感的新聞標題，於是導致讀者將戰爭輕鬆化，進而對報導也產生麻痺。亦即，在火野的演講中，他所要表達的是對於後方民眾跟前線戰士之間所表現的

¹⁵ 《文藝銃後運動講演集》（東京：文藝家協會，1941年），頁43-57。在台灣的演講內容紀錄。以下所舉火野與吉川的演講內容，皆同以訪台演講時的紀錄為底稿。

¹⁶ 文藝家協會編撰，《文藝年鑑2600年版》（日本：東京第一書房，1940年），頁92-109。

溫度差，感到莫大的失望與不平；除此之外，火野想藉此呼籲後方民眾提升自己的戰爭意識，並且不間斷地給予前線戰士們鼓勵打氣。

吉川英治〈談思想準備〉：¹⁷吉川舉自己第一次以報社派遣記者的身分前往中國戰地隨軍採訪時的小插曲為例，說明在非常時期裡作好思想準備、心理建設的重要性。接著再舉出三個例子：其一是，日本南北朝時代（1336～1392）武將楠木正成（人稱楠公）的夫人如何地扮演賢內助在楠公出征時物資極度缺乏的窘境下守護家園及楠木一族，之後在歷經喪夫喪子的悲痛中仍堅強振作的感人故事。其二是，明治十年熊本城遭敵軍圍城的時候，城內婦女們充分體恤士兵饑餓應戰並發揮細心的特質，聚集零散的米穀，竟讓士兵們吃到了久違的米飯。其三是，寬文年間有個名為武田源左衛門的藩士，領著一群農民們開墾拓荒，但他高壓獨裁的領導態度令農民們萬分畏懼。歷經十數年的努力終於開墾有成，農民們得以自給自足，安居樂業。一天源左衛門集合了農民們，說明自己的嚴苛指導乃是為了大家的後代子孫，為了我們所效忠的藩主，為了我們的家鄉（國家）。身為官吏處於君主及百姓之間，故不得不嚴格地領導大家開創安定的生活，而今任務已成，對於昔日的嚴厲態度請眾人能原諒。源左衛門說完之後便以任務已了為由結束自己的生命。吉川的這篇演說特色在於藉由前兩個例子表達對婦女們的細心與堅毅的精神之感動，更藉此提醒不可忽視婦女們乃是具有驚人力量的，並欲鼓舞在場的婦女聽眾協助當前的戰事。最後的例子則是勉勵大家若擁有如同源左衛門一般的堅強意志，則必定能渡過現在這個艱難的時局，特別是居領導位置的官僚更要具有那樣的信念。

久米正雄〈文藝的事變處理〉：¹⁸久米首先從一九四〇年（昭和 15）三月二十九日刊登在莫斯科某晚報文藝欄上的一短篇諷刺小說〈阿部大將的夢〉的內容，及其刊登的戰略目的談起。在當時的莫斯科，晚報對一般民眾的影響力極大，因此〈阿部大將的夢〉也充分地發揮了對莫斯科市民宣傳對日本的負面觀感的影響力。小說內容大致是說日本總理大臣阿部信行大將夢見，日本國內正盛行種植一種奇妙的藥草，這藥草具有令人遺忘的功能。因為日本當局企圖將

¹⁷ 同上註，頁 116-125。

¹⁸ 文藝家協會編撰，《文藝年鑑 2600 年版》（日本：東京第一書房，1940 年），頁 126-139。

這種藥草送到在中國的日本占領區，派給那些饑餓的中國人民吃，使他們忘記二十五條款之後的新仇舊恨，忘記日本人的欺凌。然結果中國人民似乎並未遺忘什麼，不但清楚地記得舊恨，對新近發生的事也恨意倍增，而蔣介石政權也依然未放棄對日抗戰。可是他們到底遺忘了什麼，日方經過深入研究的結果，這才發現原來中國人民忘了要向日本投降這事。久米說當閱讀到〈阿部大將的夢〉時，內心充滿憤怒，雖然深感這篇小說確實是極盡諷刺之能事，但是客觀而言莫斯科媒體確實巧妙地將通俗文藝與大眾媒體結合運作，在宣傳戰上可說是收的了成效。久米語重心長地主張，要對付這種陰險的思想戰手法，非得靠知識分子、文學者的力量並穩固大眾媒體不可，而文藝銃後運動的目的之一即在於此。再引用歷史學家的話「世界大戰的勝負，乃決定於德法兩國在文藝的事變處理上的巧拙」，以強調日本亦應該將日本民族所具有的藝術的、文藝的精髓充分應用於事變的處理上。

綜觀五位演講者的講演內容，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就是：文學者們所持的共同信念即是以思想教導與文化宣傳的方式鼓舞將士與後方民眾的戰鬥意識。他們極力地主張戰勝的關鍵乃在於全日本國民的精神建設及思想宣傳戰略，而在這方面，文學者則具備舉足輕重的分量，且必能不負所望地發揮出最佳的功能。從他們的發言中，尚且值得注意的就是文學者們自身在戰時體制下的文學者觀。文學者們在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號召及時局的鼓動下，從純文學者所立足的觀察者角色變身為宣傳者、實踐者，文學者們賦予自身肩負思想戰略成敗的使命。然而他們當中有些人一再強調「以一個從軍士兵的觀點，非以文學者的觀點」，這樣的聲明雖然一方面透露了文學者們無法對日漸白熱化的戰事袖手旁觀的心境，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亦未嘗不是一種放棄文學者視點，拿軍人身分作為逢迎國策的免罪符的消極行為。同時代的大多數文學者對於文藝銃後運動的意義或者是參加文藝銃後運動的文學者們所抱持的文學（者）觀，似乎都努力地想從各個角度去予以肯定並正當化。例如一份名為〈如何看文藝銃後運動〉的調查，¹⁹其中得到了河上徹太郎、島木健

¹⁹ 〈如何看文藝銃後運動〉，《文學界》（1940年7月）。

作、阿部知二、橫光利一等人的回應文章。在河上徹太郎〈如何看文藝統後運動——這個運動的意義〉中他提到：「當局在執行精動運動上缺乏精準地捕捉國民心理的敏感度，而文學者正是這方面的專家。因此文藝統後運動便是由於文學者們預見了這項弱點，而自主發起的運動」²⁰、「文學是一種無償的行為，而這個企劃不過是將文學的這項本質以運動的方式實踐」。²¹另外在島木健作〈如何看文藝統後運動——試問〉裡島木則說到：「在今天的時局下，儘管不會有人否定文學者除了透過作品以外有必要更廣泛地與社會脈絡相結合，但還是有很多人對文學者抱有保守的偏見」。²²「一個成天只關在書房裡創作的作家，有一天突然站在人群前，大倡作為後方一員的決心，確實會遭到輕蔑的」。²³橫光利一〈如何看文藝統後運動——雜感〉則說：「參加文藝統後運動的文學者們在某種意味上覺得因此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而不參加的人勢必也有因為不參加而心安理得的理由」。²⁴相對於上述贊同的言論，文藝評論家杉山平助在其〈文藝時評〉一文中，對文壇人士積極回應體制內的號召以及出版機制從商業主義轉向國益優先思想之現象有相當嚴厲的指摘。²⁵例如「一有新的組織成立就趕緊往那邊靠攏的人，並非都是優秀的分子，有時候甚至是素質低劣者為多」、²⁶「就如同在政治界已被指摘地，那些口口聲聲以國益為優先，搶先投入新體制懷抱的人，事實上是自私自利，滿腦子除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以外別無其他。在文壇亦是如此，順應新體制，立刻響應發起運動的人，並不全是真的憂心國家熱愛文化的人，只為了捉住當下的機會，為將來的地位打算的人亦不在少數」，²⁷杉山認為在社會氛圍及政客的刻意操控的影響下，文壇人士也不知不覺涉入了一場權利（力）爭奪戰並迷失其中。杉山不但對於新體制抱持相當的疑問，對部分文壇人士張著以國家利益優先的旗幟而汲汲營營的態度也甚不以為然。

²⁰ 同上註，頁 113。

²¹ 同上註，頁 113。

²² 同上註，頁 116。

²³ 同上註，頁 116。

²⁴ 〈如何看文藝統後運動〉，《文學界》（1940年7月），頁 116。

²⁵ 杉山平助，〈文藝時評〉，《改造》第 22 卷第 18 號（1940年10月）。

²⁶ 同上註，頁 211。

²⁷ 同上註，頁 212。

從上述同時代文學者的言論可見，在文學者一片高唱秉持傳統日本精神為國犧牲的聲浪背後，存在著對呼應新體制的意見對峙，以及文學者對自身價值的信心或質疑。活躍於精動運動前台的多數文學者們深信並自負於唯有文學者所具備的洞察人世機微的能力可以處理戰時下的人心問題，然而不排除當局想要利用的卻是文學者們表面上的寫作技術能力，以此配合思想宣傳戰略。而有企圖心的文學者趁此時局沽名釣譽，或者初出茅廬的作家者們則是欲藉此建立在文壇上的知名度。板垣直子在評論官方寫作部隊的論文中指摘道「獲選加入筆桿部隊一事，意味著保證他們的作家之路前途洋洋」，²⁸正因如此有些落選的文藝家們表現出極為沮喪與羨慕。筆桿部隊於一九三八年八月由內閣情報部召集作家成立，共有作家二十二名獲選參加。相較於官方的寫作部隊，自發成立的文藝銃後運動可謂為文藝家們廣開了參與新體制的大門，再加上對前次寫作部隊的憧憬及落選的沮喪，更增強了人們參加文藝銃後運動的意願，特別是文壇新人們更是躍躍欲試。

儘管對於文化團體或文化運動接二連三成立的現象，文壇人士的意見是兩極端的，但從杉山語帶諷刺的一段話「誰應該留在舞台上，誰能嶄新登場，這些若是就本人所具備的條件資格來評選的話那麼旁人是不會有微詞的，但若是因為迂闊官僚的私心，最後留下的是善於諂媚與周旋的分子的話，那可是相當危險的」，可明白地了解到在國民精神總動員下、戰時體制下，文學者們的文學（者）論深受時代情勢影響，也許他們的內在確實存在著對自我價值認同的糾葛與如何在新體制中定位自己的心理爭戰，然在當時的現實情勢下卻是唯有願意遵守當局制定的遊戲規則的人，才能繼續保有在文壇活動的舞台。而例如文藝銃後運動和它的外地文化講演行腳，以及後來的日本文學報國會等等皆是上述意識的實踐。

四、從《台灣日日新報》記事看文藝銃後運動訪台活動的樣貌

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一行在台灣總督府及台灣日日新報社的後援下，一行人在台的活動行程因此備受矚目與禮遇。十二月十六日方才開始的行程在十二

²⁸ 板垣直子，《現代日本の戦争文学》（日本：六興商会出版，1953年）。

月五日的《台灣日日新報》上即出現大篇幅的宣傳報導。〈敬邀菊池寬等諸氏文藝銑後講演會將自十六日起於全島各地展開〉的偌大標題顯目地被置於版面正中偏左下的部分，²⁹並且開宗明義地道出文藝銑後講演會是一個透過文學者的觀點表達對新體制下國民文化之感想及以積極地以文化協力為己任的自發性組織。在這篇宣傳報導中且簡潔扼要地闡明此銑後講演會的出發點乃在於藉由演講會的方式拉近作者與讀者間的距離，並結合文學者對時代的觀點與熱情，號召國民大眾一起為創造進步嶄新的日本文化而努力的主旨。此後到二十六日菊池一行人離開台灣為止，在《台灣日日新報》上刊載了活動相關報導總計十二篇，以及大幅刊登了菊池寬、火野葦平、久米正雄等人的新書宣傳廣告，其中在相關報導的部分有時也介紹講者們接受採訪的發言紀錄等等，而標題部分「文藝銑後講演會」「菊池寬」「日本文藝協會」等字眼出現次數之頻繁，充分達到打響活動知名度與宣傳的效果，在活動宣傳方面台灣日日新報社可謂善盡了作為後援單位的職責，亦可見總督府當局方面對此活動的重視及對來訪文學者們的禮遇程度。

菊池跟中野兩人十三日於沖繩那霸演講，十四日搭機來台，其他人則搭乘大和丸於十六日抵台，當晚七點在台北市公會堂作一般公開演講，十七日有勞軍演講，十九日於高雄、二十一日於台南、二十二日於台中、二十三日於新竹的順序展開文藝銑後運動講演會的台灣行腳，在上述各地一行人除了演講會以外，也到各處軍醫院慰問被稱為白衣勇士的受傷士兵，這一部分跟在日本內地是很近似的，此外參拜演講會所到之處的神社、拜會各地首長、視察公學校的國語普及狀況及參觀設施等等，則是總督府安排下的必備行程，移動中當然不乏由總督府相關幹部陪同隨行。台灣行腳結束後吉川、火野等人則轉往廣東繼續進行勞軍演講。在訪台期間，菊池一行人也跟台灣文化界人士有所接觸交流。例如菊池和中野於 15 日在矢野峰人的主持下跟島田謹二、中村哲、須藤利一、西川滿、黃得時、龍瑛宗、楊雲萍、濱田隼雄、中山侑、川合良三、藤野雄士等台灣文藝家協會關係人士進行聯歡座談會，在關於台灣、朝鮮的外地文學的問題上有意見交

²⁹ 〈菊池寬氏ら招いて文芸銑後講演会十六日から全島各地で〉，《台湾日々新報》1940年12月5日。

流，並且隔天兩人在西川及中村的陪同下拜訪了楊雲萍士林外雙溪的居所，暢談台灣文化、並飽覽了士林的風光。其他的小插曲如，當時仍是公學校學生的黃氏鳳姿因為作品〈七娘媽生〉、〈七爺八爺〉深得菊池的讚賞，而受到引薦拜會菊池。菊池還將黃氏比喻為台灣的豐田正子，³⁰並談到欲將黃氏的作品刊在《文藝春秋》上。³¹而關於一行此次的主要目的即演講會的入場狀況部分，從台日報上的十餘篇記事當中可讀取到「場外大排長龍，開場前入場券即已售罄，無法入場的民眾不願離開，寧可聚集在入口前透過擴音器聆聽，這可是近來難得一見的盛況」、³²「令全場聽眾聽得入神」、³³「對來場聽眾每人收取入場費十錢，收到的一百三十三圓六十錢全數捐給新竹州軍事後援會」³⁴之類的紀錄，另外在《文藝銃後運動講演集》中也寫道「根據報章報導，在台灣（內地）文藝家的來訪是很難得的，因此慕名而來的聽眾超過一萬人，可稱盛況空前」，³⁵綜合上述紀錄可推測聽眾來場之踴躍，而會場專注熱烈的氣氛亦可見一斑。如上述一般地，除了既定的演講會行程外，再加上慰問、視察、觀光、座談會等等，文藝銃後演講會一行人也有不少跟殖民地文化人接觸的機會，對於殖民地台灣島內進行的文化建設活動亦採取樂觀其成態度。因此就行程安排以及一行人與殖民地人的接觸情況而言，此活動看似收斂了一些支配與教導的色彩。

五位演講者基本上以精神建設為主軸，號召全體國民盡己所能地為國貢獻的主要演說內容已在上段簡述，於此不予贅述。從《文藝銃後運動講演集》中的記載可知，雖然演講會巡迴許多地方，但是每位演講者設定一個題目確定內容之後，在巡迴期間大致上是以相同的題目與內容登台，³⁶來到殖民地台灣亦不例外。然而，將和日本內地相同的演說內容原原本本地移植到台灣，五位演講者們所設定的基本立場為何，亦或說他們對此次訪台之行所懷抱的期望與目

³⁰ 〈“台湾の豊田正子”と『七爺八爺』に絶賛菊池中野両氏在台作家と交驛〉，《台湾日々新報》1940年12月17日。

³¹ 〈“七爺八爺”の鳳姿氏お礼に菊池寛氏を訪問〉，《台湾日々新報》1940年12月18日。

³² 〈銃後人に多大の感銘賑はつた文芸銃後運動講演の夕〉，《台湾日々新報》1940年12月17日。

³³ 〈文芸銃後講演会高雄で開催さる〉，《台湾日々新報》1940年12月20日。

³⁴ 〈新竹の文芸銃後講演菊池氏、同郷者と座談会〉，《台湾日々新報》1940年12月25日。

³⁵ 《文藝銃後運動講演集》（東京：文藝家協會，1941年），頁144。

³⁶ 《文藝銃後運動講演集》（東京：文藝家協會，1941年），頁145-146。

的為何，這些在他們各自的演講當中並未有清楚的說明。若從他們接受訪問的談話記錄中去考察，則可以描畫出他們的對殖民地台灣的定位及觀看方式的輪廓。

在一行人抵台之前，最早對此次文藝統後運動的台灣講演行腳發表意見的是吉川英治。吉川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說道「台灣在南進政策上的重要性已無需多言，……以往文學者在對台灣的歷史性格方面的理解呈現相當灰暗且令人憂心的現象，但是所幸近來文學者對南方的關心程度日益升高。此次訪台之行不但在日後向內地介紹台灣之際或在思考今後的文化運動上將大有裨益。期待返回內地以後能將此行對台灣的視察和研究以某種形式表現在自己的創作上」。³⁷又如菊池和中野兩氏抵台接受記者訪問時，菊池則是一邊以詼諧的語氣說道「台灣的月亮實在很大」邊嚐著柚子、椪柑等水果品味南國的浪漫氣息，接著又表示「聽說台灣人對受傷士兵的照護是全日本最親切的，真的很令人高興」、「寫作最多關於台灣的作品的當屬佐藤春夫，但我希望是由更多住在台灣的人們來書寫台灣，呈現作為南進基地的台灣的姿態」。³⁸另外久米正雄在接受訪問時則說「菊池、吉川和我都是第一次來台灣，我們想看看目前台灣的真正狀況。我想把我們在台灣看到的第一印象傳達到內地正是這次我們受邀訪台的目的之一。……現在的情勢，台灣在地理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和朝鮮齊頭並進地，台灣在作為日本外地政策第一線方面，啟發我們許多的思考。……台灣不僅是南進基地，在目前日本的新體制下台灣更是越發顯出其重要性……」。³⁹以上吉川、菊池及久米的言談中不得不令人注目的就是，它們當中所透露的殖民地台灣印象是：南進基地、南國的浪漫氣息。尤其是前者，只要攤開當時的報章雜誌一定不難察覺，媒體上充斥著關於南進的言論。以《台灣日日新報》的紙面為例，在文藝統後運動講演會訪台期間也適逢長谷川總督新上任，另外還有日本社會學會的第十五次大會在台北帝國大學舉行。長谷川總督的到任演講和日本社會學會大會同時都以，建設東亞新秩序及南進政策中殖民地台灣的定位為主題。

³⁷ 〈菊池寛氏ら招いて文芸統後講演会十六日から全島各地で〉，《台湾日々新報》1940年12月5日。

³⁸ 〈“台湾の月は大きい”白柚の味を讃めながら菊池氏第一印象を語る〉，《台湾日々新報》1940年12月15日。

³⁹ 〈“思つた程暑くない”日本文芸協会の一行来台〉，《台湾日々新報》1940年12月18日。

從上述的現象可見，文學者們對殖民地台灣的觀看方式基本上是合乎當時的政治及言論思想主流的，但反言之文學者的觀點近乎與國策同調，並未呈現尖銳獨特的觀點。而以異文化、異民族、浪漫主義的視點觀看殖民地台灣的方式，其歷史由來已久，基本上可說是日本文人在書寫殖民地台灣時的基調。然而在一九四〇年的這個時點上，文學者們對殖民地台灣的觀看已從由浪漫主義轉向至從精神文化的角度去切入、進而定義台灣在南進政策中的位置。所謂的精神文化之於台灣人而言則是當時被積極推行的日本人化、皇民化下的日本精神文化。也就是說，文學者們所矚目的是，在前進南方、建設南方的過程中，殖民地台灣所提供的示範性、標本性。從上述文藝統後運動的文學者們的言論中，可以察覺內地文學者對殖民地台灣印象的更迭，以及既有觀看方式的式微。如菊池的言談中，雖然也觸及到台灣特有的風土，但僅僅是停留在極為浮泛表面的瞬時印象罷了。

文藝統後運動講演團一行五人此次的訪台經驗，並未如久米或吉川自身所期許地順利轉化到實際的文本內容。但是例如在相近時期由杉山平助所發表的〈論台灣〉(《改造》一九四〇年六月)、〈台灣之旅〉(《改造》一九四〇年七月)，以及描寫較台灣更迥異於日本風土文化的蘭印為主的高見順〈蘭印日記〉(《改造》一九四一年五月)、〈蘭印印象〉(《改造》一九四一年六月)，吉川英治《南方紀行》(一九四三年)，這些旁系文本中，應能推敲出作為同時代徵用作家共通的心像風景。在下一章當中將觸及〈啦蘭印印象〉、〈南方紀行〉的部分內容和問題。⁴⁰

五、非經由文學實踐的殖民地台灣表象

一九三六年第十七代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提出台灣統治三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中日戰爭全面擴大之後的一九三七年九月台灣總督府設立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自此皇民化運動正式展開。一九三八年小林總督發表

⁴⁰ 承蒙審查委員建議對相關文本進行橫向比較的重要視點，由於同時期南方徵用作家的文本為數繁多，為能篩選適當的文本，並作詳細的比較，筆者期另以專論的方式，再依據這個重要的視點進行更細緻深入的討論。

台灣人志願兵制度。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頒布「改姓名促進要綱」。而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一行人訪台時可謂正值皇民化運動白熱化的時期。當時在殖民地台灣所實施的皇民化運動，簡而言之就是把台灣人從生活樣式到精神思想；從表面至深層徹底改造成天皇子民的運動。而作為天皇子民則必需具備尊皇、敬神以及奉公滅私的精神，在菊池的演講〈事變與武士道精神〉中也標榜著類似的四大精神。尾崎秀樹曾說道「日本對台灣將近五十年的統治歷史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將經濟的、社會的差別狀態藉由精神面的一視同仁、日台同化加以掩飾敷衍，拔除抵抗的獠牙，製造一群籠絡、順從的『皇民』的歷史」，⁴¹又說「借用當時的老套說法，若所謂的同化是意味著成為日本人的話，那麼所謂的『皇民化』，就是『成為一個好的日本人』。而統治者所期望的『皇民化』的實態並非是要台灣人『生為日本人』而是『死為日本人』。因此，要『成為一個好的日本人』就是要找到一條可以『死為日本人』的路，然後朝那個方向前進。『皇民化』的美名背後隱藏著特別志願兵制度、徵兵制、及配合台灣要塞化的戰力動員計畫」。⁴²再回顧一下菊池訪台時的演說〈事變與武士道精神〉重點正是，教人如何捨命為國獻身，發揮皇國精神，其中不斷強調的就是，只要是日本人任誰都可以義無反顧地奉獻自己，為國犧牲含笑而死，這才是作為一個日本人最正確的路。這跟尾崎所說的『死為日本人』的皇民化運動內幕正不謀而合。這樣的演講內容在當時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的殖民地台灣，不管是對在台日本人亦或本島台灣人而言想必都是非常煽動且露骨的；對在台日本人而言它們發揮的只是精神感召與心理建設的作用，然而之於皇民化運動下的殖民地台灣人，文學者們的演說所指示的幾乎是作為一個皇民的具體方法論。觀察菊池等五位的演講內容尚可察覺一個特色，它們面對聽講對象並不使用固有名詞，所有的聽講對象都被以銃後或後方民眾這個說法涵蓋。表面上它看似是一種對殖民地台灣人一視同仁的意識表現，然事實上是無視殖民地台灣民眾在被迫皇民化的過程裡所遭遇的各種包括心理層面的困境與掙扎，而將之一般化、普遍化的暴力行為。

⁴¹ 尾崎秀樹，《近代文學の傷痕》（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6月），頁138。

⁴² 同上註，頁139。

亦即，隨著南進政策於意識和行動面上的愈發落實，殖民地台灣在軍事、海上交通的中繼意義，以及精神面上的據點意義就愈發突顯並受到重視。所謂的精神面即指皇民化運動，殖民地台灣的皇民化運動可視為將皇國的精神文化傳至南洋南支之前的一個準備或實驗階段，因此在皇民精神的養成上，殖民地台灣亦同樣具備重要的據點意義。殖民地台灣作為南進政策的基地或中繼點，以及在轉進中國大陸南方的路徑上的途經點的意義，在經過諸般的強調與宣傳下似乎已成普遍存在的常識，文學者們對它的認知亦不出這個境界。因而文藝統後運動的台灣巡迴講演除了肩負著激勵後方人心士氣的功能以外，同時更重大的意義與使命是基於南進政策上的精神文化建設一環，促進皇民化運動推進。如上所述，文學者們建立在南進政策觀點下對殖民地台灣的認知，不僅表現在他們的演說或訪談中，也反映在他們的創作行為上。以下將試舉此次訪台成員亦或同時代作家為例，看看戰時體制下文學者們對殖民地台灣作為書寫題材的意識程度。

首先以菊池和中野的例子而言，抵台後中野實於接受記者訪問時被問及訪台感想，中野則淡淡地以「沒有什麼特別要說的，但睽違八個月之後再度來台覺得挺令人懷念」一句話回應。菊池也在次年一月的〈話之屑籠〉中提到「對我而言，雖然沖繩和台灣都是初次造訪之地，但是本人對土地與風景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因此也沒有為之感動」。由上述發言或記述可看出他們對於殖民地台灣特殊的人文與風土並不懷抱興趣或好奇心，這種消極與被動的心態將影響他們對殖民地台灣的觀看，同時基於那樣的心態肯定難以產生對台灣的積極書寫行為。另外，在前面曾提及，吉川英治曾在接受記者訪談時表示要將在此次訪台的見聞感想傳達給內地讀者，然而吉川終究沒有為此次的訪台活動專程留下文藝性的紀錄。日後吉川在一九四二年八月間從福岡到佛印（今越南）在南洋地區進行了前後為期三週的旅行。以這三週的旅行日記為基礎後來集結成一冊《南方紀行》。在旅行的往返中途經台北與高雄，這段短暫停留的紀錄在全數二九七頁當中占了十五頁，⁴³夾雜在〈從內地到比島〉

⁴³ 吉川英治，《南方紀行》（大阪：全國書房，1943年），頁27-45。

一章的〈高砂報國隊〉小段落裡，篇幅雖短，但對當時原住民的皇民化到從軍有一段介紹與見解。

類似的形態從高見順的〈蘭印印象〉也可看到。一九四一年作家高見順前往南洋，從蘭印（今印尼）返回內地的途中四月三十日抵達高雄，五月二日從基隆離台。這段短暫的殖民地台灣之旅記錄在他著名的《蘭印印象》裡面，在整個以蘭印為記述主題的紀行當中，台灣以一個往返南洋之間的航路必經之點登場，混雜藏身在一個南洋紀行裡，在此又再一次顯現了殖民地台灣在作為一個被書寫的對象上的中繼性格。其中一段高見順與友人一同參拜台南開山神社時的感想：「本島人也好、內地人也好，幾乎毫無區別地以虔誠的表情參拜著。……本島人參拜者的後方站著內地軍人合掌祈禱。在軍人的後方則站著我們。換成是在爪哇，土民要站在荷蘭人或歐洲人的前頭是根本不可能的……」⁴⁴高見以一個內地人的眼光，去評價殖民地台灣表面上呈現的一視同仁景象，並顯得沾沾自喜，但除此之外高見亦無意再有更深入的觀察或追究。

另外，以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一員來台的火野葦平其實在那之前已有多次停留台灣的經驗。並且由於戰地報導作品及作品的電影化，在當時火野的名字在殖民地台灣的傳播媒體上出現頻繁，可說是頗具知名度的內地作家之一。火野葦平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前後在福岡參加完「南支展」返回所屬的南支派遣軍部報道部的途中經由台灣在台北停留一星期期間，受到西川滿邀稿而寫下一篇散文〈經過華麗島〉，⁴⁵被視為珍寶放在《華麗島》創刊號的卷頭作為宣傳。然而這篇文章充其量只能說是篇賀文，雖然提及一些台灣藝文界的人與事，卻讀不到火野對殖民地台灣的真正感想。文章最後的一段文字「帶著繁雜的軍務，沒料到途經台灣，卻巧遇台灣詩人協會的成立」，道出了〈經過華麗島〉這篇文章成立的偶發性，全文可讀出作者一種輕描淡寫的態度。同年的十一月二日火野再度來台參加「時局·南支展」，當時適逢媒體上強力地打著火野的「兵隊三部作」的廣告，而拍成電影的〈土地與軍隊〉也正同時上映，因此火野受到媒體關注的程度自然不在話下。而數度經由或短期停留台灣的經驗，假設火

⁴⁴ 高見順，〈蘭印印象〉，《改造》6月號（1941年6月），頁195。

⁴⁵ 火野葦平，〈華麗島を過ぎて〉，《華麗島》第1號（1939年12月），頁5-6。

野接觸了一些殖民地台灣的現狀，對本島有某種程度的了解或感想也是很合理的。然而，在火野戰時下的作品當中尚未能讀到他對殖民地台灣旅行經驗的描寫或紀錄。

戰時下，殖民地台灣作為一個獨立的被書寫對象而見諸於報章雜誌的機會漸趨減少，諸如前面所舉吉川英治《南方紀行》或高見順《蘭印印象》的例子一般，關於殖民地台灣的描寫被夾雜、藏身匿跡於其他的書寫主題之下的情況，事實上並非特例。南進政策觀念領先的結果，侷限了文學者們對殖民地台灣的想像，致使文學者們只以一種過渡的心態去觀看或表象殖民地台灣。這未嘗不是殖民地台灣表象或相關文本在內地媒體上的曝光率並未與其在南進政策中的地位日顯重要之狀態成正比，反而呈現後退現象的其中一個要素。

六、結語

一九四二年在台日人評論家速河征夫在一篇文藝時評中，針對當時訪台內地作家們的態度有所指摘，他說「近來內地作家們僅把台灣當作前往南方時的踏板、通過點，就算期望他們能正確地認識台灣，然而他們對台灣的認識卻終究僅止於中途經過的匆匆一瞥，這真是件令人感到失望、空虛的事。……以往作家來台主要是以演講為目的，因此只有在演講以外的空檔時間裡才想看看台灣，於是認識台灣似乎是次要的。期盼作家們能把演講放在其次，而好好地認識真正的台灣，並能從文化的角度提供對台灣統治的意見」。⁴⁶這段話明白地道出了當時殖民地台灣僅是前往南方的中繼點，並非來台作家真正的目的地亦非作家們關心所在的窘況，也隱約暗示了南進據點論對內地作家的訪台心態之影響。而不可諱言地，那正是當時來台作家的現狀，這儼然也說明了殖民地台灣在作為一個書寫對象或主題之地位上的漸趨低落、式微的現象。對於這種現象的出現，本論文以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的訪台活動及其文藝性文本的生產狀況為檢討事例，並視國民精神總動員下、戰時體制下的文學（者）觀以及同時期南進政策論·據點論的甚囂塵上等時代因素為影響要因進行了考察和分析。

⁴⁶ 速河征夫，〈作家的來台〉，《文藝台灣》4卷2號（1942年5月），頁101。

文藝銃後運動發起人菊池曾在一九三九年一月的〈話之屑籠〉中說道「吾人認為文學者順應時勢作各種努力，是誠屬不得已。……無視時勢只專注於創作，終究是寫不出好作品來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間的戰事勃發、緊接著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開始後，諸如此類瀰漫國策味的言論便開始在日本文壇渲染開來，它暗示了當時文學者們拋棄文學者視點，屈服於時勢的文學觀，亦即以舉國一致為優先的立場。這種文學觀的氾濫及主流化，非但促使文學者們積極地投身於標榜戰時新體制精神的各種文化運動，同時一方面也是合理化了文學者們與新體制、國策同調的行為。菊池的另一段話：「精動運動與其說是組織毋寧說是人的問題。亦即精動運動是要集合起對國民能產生人格的感化力量、能為精動精神提供新鮮的表現方式、在宣傳方法上使用新機軸與新技巧的人。精動是一個大宣傳運動」（一九四〇年五月〈話之屑籠〉），這當中明白地定位並宣示了文學者在國民精神總動員裡的意義、地位甚至價值。就在文壇大老菊池的上述激情言論與登高一呼，再加上在文學者們的內在滋長的對確認自身主體價值的躁急感結合之下，文藝銃後運動於焉成立且迅速地展開實際的文化宣傳行動，範圍甚至遠到滿洲、沖繩、台灣、南支等地。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的訪台活動除了秉持其一貫的基於國家優先、舉國一致精神的人格感化與文化宣傳之外，更在南進據點論及殖民地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上發揮了在他處所未有的作用與意義。然而誠如奧出健論文所嚴厲指摘的，「他們的演說內容雖然有趣，但是從中我們卻看不見作家各自的哲學。他們的演講只是教人該如何欣然接受自由受到束縛，被強求赴死的悲慘現狀，並且配合那樣的狀況。說穿了那樣的言論盡是站在權利者的立場所唱的宣傳口號罷了」。⁴⁷但事實上當時不管日本內地或外地的殖民地都籠罩在那偉大激情言論的欺瞞之下。文學者們雖然強調戰時體驗對創作的必要性，而文學者們大陸、滿洲、南方，北進南進地也看似非常活躍，可是除了報導性質的大陸文學、戰爭文學的應運而生以外，大多數的作家的創作行為卻並未因而活性化。文藝銃後運動訪台的五位文學者當中，沒有人將此次的殖民地台灣旅行經驗積極地實踐於對殖民地台灣的書寫行為上亦是一例。

⁴⁷ 奧出健，〈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の紀錄——菊池寛、小林秀雄のことなど〉，頁56。

戰時下當局為了延攬更多的文學者協助新體制的運作，因此對待作家們的態度是盡量不施加壓力的。例如在小島政二郎的〈從軍日記〉中記載的一段情報部官員的發言「二年後、三年後或十年後能創作出個傑作也就行了，不，就算終其一生不寫作有關從軍經驗的作品也無所謂」，⁴⁸以不強迫寫作義務的柔軟態度博得文學家們的信任。因此在當時的文學者們的認知裡，參與新體制運動跟轉化成積極的創作行為並不具有絕對的關係。戰時下訪台內地作家對將殖民地台灣旅行經驗作品化的不積極，跟上述的心態也許不無相關。但殖民地台灣當時被放置的處境，以及以國益優先、文化宣傳與思想建設為重點，再加上當時普遍被文化人所認知接受的南進據點論在文學者觀念當中的領先情况等，更值得視為導致殖民地台灣的諸現狀輕易地被以一種全體主義的觀點所概括，作為書寫主題的價值因此漸被忽略，於是乎漸漸形成以殖民地台灣為書寫主題的文本從新聞雜誌等媒體間消失，亦或僅在其他的紀行文本當中以一個中繼點的姿態出現之現象的重要因素。

⁴⁸ 小島政二郎，〈從軍日記〉，《三田文學》（1939年4月）。

